

从杨杏佛家藏书信看清末民初官费留美学生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朱玖琳

《团结报》2016年6月16日第5版

杨杏佛是第一批稽勋留学生，从1912年至1918年在美留学六年间，他始终心怀报国之志，热心向学，先入康奈尔大学电机系学习，1916年在康奈尔毕业后复入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在美国，他参与了中国留学生的一系列盛事，包括中国科学社的创建和文学革命的争论等。1918年5月，他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时，他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民国“产婆”赵凤昌之女、自费留美女生赵志道在美结婚。

杨杏佛家藏^①系杨夫人赵志道以秘不示人的方式，历经战火、“文革”等各种劫难而保留下来。除了近600封家信外，还有杨杏佛归国初期所记的日记3本、宋庆龄致杨杏佛函17封，此外还有科学社同仁和东南大学同事来函、民国名人谭延闿、吴稚晖、于右任的赠墨，以及杨杏佛的手稿、藏书、照片等等。

杨杏佛家藏，尤其是杨杏佛在美留学时期的书信，不仅生动展现了杨杏佛在美留学的经历，也间接反映了清末民初的庚款生、稽勋生等官费留美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在杨杏佛从1916年10月3日到1918年7月20日给赵志道的300余封信中，频繁出现了以后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术领域或站在政坛高地的胡适、张奚若、任鸿隽、赵元任、梅光迪、胡明复、饶毓泰、程孝刚、朱经农、陈藩、唐钺等，以及陈衡哲和柴冰海等女界精英。这些书信可说是研究中国近代留学生史的第一手史料。

一、志在报国加入同盟会

1912年11月，杨杏佛、任鸿隽、刘鞠可、黄芸苏等原临时政府秘书处工作人员，加上其他第一批留美的稽勋生共11人一起从上海出发，乘船赴美。^②在原临时政府秘书处工作的这些年轻人“要做官的当然有官可做”，但是他们决定到国外去求学，“将来再以所学报效国家”。^③在上海等待赴美留学期间，杨杏佛结识了同批留美的稽勋生宋子文。两人一经结识便关系交好，杨杏佛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宋子文之父宋耀如曾在中国公学教书，这也许是两人一见如故的主要原因。临行前，杨杏佛“曾与宋子文至其家”^④。他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杨杏佛1933年遇刺身亡。

1912年12月1日，杨杏佛与任鸿隽乘长途汽车从美国纽约城来到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城（Ithaca），当晚暂宿胡适处。绮色佳城是一座典型的美国乡间小城，景色秀美，杨杏佛赞其“山水绝幽，居人颇少，诚古桃园也”^⑤。12月18日（即冬月十日），已在此安定的杨杏佛发出了第一封家书，他告诉六妹，他已平安到美，计划于次年春天入康奈尔大学，并至为关心地询问父母的情况。^⑥而在给好友柳亚子的信中，刚刚离开故土的他已经在急切地询问“国中近状如何”。^⑦不久，他告诉柳亚子，他已经从西报及友人华报中“略窥端倪”，

^① 杨杏佛家藏由其哲嗣杨小佛和杨澄于2008年捐赠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宋庆龄陵园管理处择其精华编辑出版《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以下简称《啼痕》）一书。本文选用的杨杏佛家藏一部分已在《啼痕》中出版，余则均出自宋庆龄陵园管理处所藏原件。

^② 见杨杏佛致柳亚子函（1912年11月），《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1页；“稽勋局选派留学生”，《教育杂志》1912年第4卷第8号，第56页。

^③ 任鸿隽：《前尘琐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712页。

^④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8月14日），《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以下简称《啼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259页。

^⑤ 杨杏佛致柳亚子函（1913年1月4日），《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11页。

^⑥ 杨杏佛致六妹函（1912年12月18日），《啼痕》，第251页。

^⑦ 杨杏佛致柳亚子函（1913年1月4日），《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11页。

对“故国近状日趋破败”，“辄为长叹”^①。

杨杏佛在给赵志道的情书中，曾这样表白自己道：“国、亲与君三爱在心。今则国不成国，亲远莫及，君在咫尺而不能见，吾安得不佯狂颠倒耶！”^②他屡做如此表白，以至于赵志道不知道是出于真心还是戏谑，劝杨要“为国珍重”^③。

少年老成的杨杏佛在革命党人的大本营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便取字“死灰”，表达对清王朝的绝望。他曾在赠与大姐的照片背后题《风入松》词：“苍茫故国遍烽烟，残照泣啼鹃。”^④年方十五六岁的少年，却已自比杜鹃啼血呼民贵，深怀忧国忧民之情，故而不久便在老师雷铁崖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

在离国赴美留学前夕，杨杏佛在上海购买了一对五色旗带往美国。在美留学期间，杨杏佛等人时刻关注着祖国的讯息，“每见民国有倾覆之虞则出旗凭吊”^⑤，他曾作诗言志道：“生当为国瘁，死当为国殇。”^⑥

1917年5月，刚刚大考结束，杨杏佛等哈佛留学生看到美国《星期六周报》上刊载了一篇论日本在中国之势力的文章，“描写日人之野心，读者发指”，于是杨杏佛自愿将其翻译成中文，“由哈佛同学集资刊为小册播诸中国”^⑦。为尽此“不可不尽”之责，杨杏佛在暑假中穷一星期之力“日夜译报”，译成万六千余字，他将尽此责视为“报国之一途”。^⑧杨杏佛译成《日本在中国之势力》后，由同在哈佛修工商管理硕士的尹寰枢代为誊抄，并为之作序。^⑨不久印成小册子5000本，8月3日，杨杏佛给赵志道寄去一册，赵志道又寄回国内给赵凤昌看。为将小册子分寄国中各地，8月11日刚从暑期务工处返回康桥的杨杏佛便同尹寰枢等五六名留学生聚集在一起，为书写邮寄地址而大忙不已。^⑩

正因为杨杏佛和任鸿隽一样都怀有一颗赤诚的眷眷报国之心，所以赵志道在给父亲赵凤昌的信中介绍两人时说：“杨任二君诗词甚佳，而亦道德甚高。”¹¹

二、科学救国之梦

1914年6月10日，大考刚过，当晚，十来个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便聚集在一起，商议创办一份在中国宣传科学的学术期刊。¹²他们分别是稽勋生任鸿隽、杨杏佛和庚款生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等。为创办《科学》杂志，他们发起成立了科学社，由杨杏佛手写付印的《科学社招股章程》定科学社宗旨为“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¹³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举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胡明复（会计）、秉志、周仁五人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杨杏佛为编辑部部长。¹⁴中国科学社社员依其所学科目分为若干股，杨杏佛是机械工程股股长。¹⁵

自科学社成立、《科学》创刊后，杨杏佛心中无时不刻不为“科学”所念，他视“科学”的重要性仅次于爱人和双亲，并常以此来对赵志道表忠心：“吾心为君取共半，他一半为父

^① 杨杏佛致柳亚子函（1913年2月6日），《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13页。

^②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6月6日），《啼痕》，第256页。

^③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1月22日）。

^④ 见《啼痕》，第96页。

^⑤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7月12日）。

^⑥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6月26日）；《康桥集诗》，《啼痕》，第194页。

^⑦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5月21日），《啼痕》，第253页。

^⑧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6月11日）。原件藏宋庆龄陵园管理处，下皆同。

^⑨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6月11日、8月3日）。

^⑩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8月3、7、12日）。

¹¹ 赵志道致赵凤昌函（1917年1月）。

¹² 任鸿隽：《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科学》1917年第3卷第1期，第15页。

¹³ 胡适：《回忆明复》，《科学》1928年第13卷第6期，第829页。

¹⁴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724页。

¹⁵ 张剑著：《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47页。

母、科学取去。”^①在杨杏佛影响下，赵志道于1918年3月加入中国科学社。^②身为编辑部部部长，杨杏佛不仅要为《科学》约稿，而且自己还要隔三岔五地为《科学》翻译和撰写文章，并参与科学社社务。在他留美时期给赵志道的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事情就是为科学社奔忙。

条举如下：

此间十二日为哥伦布日放假，拟闭门为《科学》作文，出门更无去处，忙可消愁，是诚不幸之幸矣。（1916年10月10日）

日来因在哈佛中国学生会演说《中国之实业情形》（此文后以《中国之实业》为题，连载于《科学》1917年第3卷第3、4、5、6期——笔者注），收拾材料费时颇多，已于昨日卸责，肩头轻一负担，惟尚拟详论，载之《科学》，故仍不能自由耳。（1916年10月29日）

日来校课略轻，而《科学》事又堆积一枷，未去又上一枷，自由何难得如是。昨夜编辑至十二时，尚在Perkins Hall，归时风寒于水，鬼气逼人。然月色在林，小星窥人，四顾苍茫，别饶逸兴，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境也。（1916年12月7日）

近方力忙《科学》文稿，此事毕则吾身自由矣。（1916年12月20日）

考后若君拒吾来孟河，则闭户为《科学》作文耳。（1917年1月19日）

日来忙《科学》，且有课，殊不闲。（1917年1月31日）

两日忙杀，忽已过去。昨日科学社办交际会，今日审查会。实则过去一星期中，无日不为《科学》作文也，果日日如此，非退学不可矣。（1917年2月5日）

校课、《科学》交迫，竟不能静坐。（1917年3月9日）

公有“科学”，家有病父，心有汝和（即赵志道字——笔者注），身有校课。四斧伐枯树，吾非铁，不能不溘然而尽，天实为之谓何哉。（1917年3月12日）

日为《科学》作文几双管齐下，幸校课少轻，尚能专力一事耳。（1917年3月23日）

这几日忙校课，忙《科学》，大约初三日前可将诸事办好，不致误事。（1917年3月28日）

上星期为《科学》作文四千余字，为校课作两报告，虽忙而不觉劳。（1917年4月3日）

假已来，当为《科学》作文。（1917年4月14日）

明日起当力作文及办“科学”事。（1917年4月17日）

今日编辑《科学》成，下星期有一报告甚短（五百字），故甚乐。（1917年4月28日）

吾月底课完肯即入厂工作，夜间拟译一书《原效》，且须编辑《科学》，预备会辨，一日廿四小时中当无间愁余地。（1917年5月4日）

今日为《科学》去半日。（1917年5月6日）

近来怕痛苦寐，日读三四小时书，作二三小时“科学”事，余皆付之昏梦。（1917年5月29日）

哈佛辩论事已辞去，学生会亦无去意，惟科学社事不能得代尚费踌躇耳。（1917年7月7日）

夜间复忙“科学”，审查一文稿，讨论常年会事，至十一时乃就寝令侄元任（即赵元任，与赵志道有族亲。——笔者注）之榻。（1917年8月12日）

本星期六七当忙《科学》，明后日当忙报告及实验。（1918年1月8日）

前昨两日拼命忙《科学》，昨晚十一时始完，已寄沪肩上又轻一担，但本月稿又须耽心耳。（1918年1月10日）

本星期两报告皆作成，现须复假中所得信及忙编寄《科学》，大约星期日可完矣，十五以前尚有两报告须作，过此便是寻常功课矣。（1918年1月14日）

今明两日皆无课无考，今日拟为《科学》作文（夜），明日上午可毕。（1918年1月24日）

^①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2月24日）。

^② 见《科学》1918年第4卷第1期，第102页。

日)

项将第二期课程表抄录一份寄君，欲君知我每日作何事。表中星期六下午留以待君，故作 T.D.，星期日则非为君即为“科学”。下学期当拼命大忙，愿君助我精神也。(1918年1月26日)

今日本拟为《科学》作文，不意竟因看火费去三小时，可谓笑话。(1918年2月3日)

科学社是几个志在科学救国的热心青年的义举，初创时“暂时取一种公司形式，入社的须交股金五元，作为刊行《科学》资本”，“当时草拟章程，编辑文字，以杨杏佛、胡明复、秉农山、赵元任、周子竞、邹秉文诸君为最热心”。^①在《科学》上投稿向来不收稿费，主持编辑的人也不受薪资。^②他们非但没有任何收入，而且还不断捐款，并为之付出极大心血。尤其科学社初创时，在美期间以编辑出版《科学》杂志为要务，作为科学社编辑部部长的杨杏佛为之所作的付出我们可从上文杨的亲笔中形象地感知。

这班青年才俊做事极为认真，相互之间会因为意见相左而激烈争论，甚至横生龃龉。

中国科学社第一届分股委员会委员长陈藩是杨杏佛在美时期新结交的朋友。陈藩回国后不久于1918年11月英年早逝，杨杏佛闻之在日记中唉叹道：“嵩青素健，能耐劳苦，尤热心公益，实为中国实业界之健将，吾党之良才，今竟赉志而没，诚中国之不幸也。”他一直珍藏着陈藩于1916年11月4日给他和任鸿隽二人的信。那封信是陈藩为了规范名词翻译，将其拟定的厘定名词通章及凡事进行方法四条发机械股股长杨杏佛和化学股股长任鸿隽，征求意见。但是就是与这样的挚友，生性孤傲刚直、心直口快的杨杏佛也会与他争论不休。他曾在给赵志道的信中说：“近因科学社事与陈藩君颇多争论，尚未终场，大战小战遍地干戈，诚多事之秋也。一笑！”^③

与陈藩的争论尚可一笑了之，对于在中国公学时期的老朋友、科学社社长任鸿隽，杨杏佛就不那么客气了。1917年2月，杨杏佛因为“编辑《科学》事与人龃龉，颇蒙退志”，任鸿隽出面斡旋，但是杨杏佛反而迁怒于任，“与任君因科学事纠葛”，任鸿隽甚是无奈，“自谓所言甚和平”，但是杨杏佛却认为这个和事佬出言误伤了他，他甚为怨怒地复书任鸿隽：“见路人毒骂则张口而笑，则家人接行，则疑恨失度，爱之愈深则倚望之亦愈甚。”^④

1918年2月，杨杏佛终于与科学社编辑部书记钟心焯因结下仇怨而决裂，3月3日上午10时，召开《科学》编辑月会，会上决定“书记一职删去，由部长总理一切，重新组织”。杨杏佛心中为之一快，他的挚友唐钺、程孝刚、饶毓泰纷纷向他伸出援手，以解其失去助手之患。^⑤

但是因为编辑《科学》而与人多有矛盾的杨杏佛渐渐地萌生了厌意。是年5月，杨杏佛以即将归国为由，将《科学》编辑事委托给赵元任。此后，他彻底退出编辑部。他在6月9日给赵志道的信中写道：“现科学编辑事已卸肩，从此当以社员办事，当不复为人眼中钉。”杨杏佛辞职后，《科学》月刊刊登了启示，将杨的辞职原因解释为他即将归国。

对于杨杏佛的缺点，1918年10月22日，在归国船上，一同回国的任鸿隽“念归国后将各分道”，以互道所短来代替临别赠言。任鸿隽说杨杏佛：一、“出言常过实”；二、言语“时或纵言所不知之事，言亦过实，则失信用，以不知为知，则人并以所知没之”；三、行事“则失之图成过切，不审手段之当否，不知目的虽正大，时或因手段之不同，而有君子小人之分”。杨杏佛闻言“如面秦镜”，幡然醒悟自己在科学社中不得人心之由，遂发誓“自今

^①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723页。

^② 任鸿隽：《〈科学〉三十五的回顾》，《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719页；任鸿隽：《五十自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683页。

^③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5月18日）。

^④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2月8日、11日、24日）。

^⑤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8年2月26日、3月3日）。

日始当慎言语、谨行事，庶不负良友”，并在日记封面补记下“慎言谨行”座右铭。^①

三、南社诗人的文学革命

1912年1月，杨杏佛在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工作时，与南社主盟人柳亚子相识。柳亚子仅在秘书处工作了三日，但这三日的接触让他对杨杏佛的“语言妙天下”^②颇为敬佩，遂介绍杨加入南社。杨杏佛诗词俱佳，在美时期他经常与友人诗词相和，在他给赵志道的书信中也常会看到他的诗词新作。归国前，他将在美留学时的诗词佳作重新誊抄，装订成《康桥集诗》和《康桥集词》各一本。

南社社员有“集龚”风，杨杏佛对龚自珍也颇为推崇，以致在给赵志道的信中，屡屡引龚诗述怀。在他思念赵志道夜不能寐时，他引用龚自珍“磋砣复磋砣，黄金满虚牝”句哀叹自己虚度光阴一无是处，希望赵能以一书以开其心眉。^③在赵志道跟他使性子时，他引龚自珍诗“欲求飘渺反幽深，悔杀前番拂袖心”、“人难再得始为佳”，劝赵珍惜眼前人。^④

1915年，杨杏佛介绍科学社社友梅光迪、胡先骕和任鸿隽加入南社，三人于1915年4月填妥入社书寄回国内，入社号码依次为439（梅）、440（任）、441（胡）。^⑤南社“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⑥。1915年夏，在绮色佳，胡适同梅光迪、任鸿隽、唐钺和杨杏佛针对中国的文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胡适提出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活文字。此言遭到梅光迪、任鸿隽的坚决反对，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就此开始。^⑦1916年，他们的争论最为激烈，当梅光迪对胡适开始人身攻击后，胡适也对梅光迪进行了反攻，同时将打击对象扩充到南社，这引起了柳亚子的不满，柳亚子于是起而反驳。同时，南社内部也掀起了同光体之争。在南社内部的争执中，胡先骕是反对柳亚子，推崇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这场争论中，杨杏佛虽算不上反对文学革命，但其立场在初时也是比较偏右的。当时，与胡适同道的赵元任也在探讨“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的问题，提出国语罗马字化的可能性。^⑧杨杏佛认为将罗马拼音法行于汉文“绝无是理”，“中国文字可繁可简，可高可低，处今文明发达之世，正宜发挥光大之，岂有以罗马拼音代之之理。”^⑨。而对白话文和白话诗他并不反对，所以当梅、任与胡“宣战”时，他“往往以事外人自居”，“作壁上观”。他认为胡适和胡先骕的观点“有理可衡，有物可证”，无容置喙。“若思想而高美，无论文言白话皆不失为上乘诗；若摭拾陈言，或但求易解，则两失之。故于诗体之争不置可否。新派中人反对文言诗之理由最大者在不通俗，而不通俗之故，则由于用典用古奥字，若去典与古奥字，古诗何尝不可通俗，渊明诗其证也。胡适之近作《尝试集》，以白话作诗，实则其中佳者皆不用典、不用古奥字之古诗耳。故白话诗之争论，不在诗体而在用字，双方所持汪洋河汉之理由，皆小题大做而已。”^⑩

杨杏佛不反对白话文，也不反对白话诗，可他依旧保留着旧有的习惯，从他给赵志道的信来看，即没有句读，还经常用典用古奥字。以至于赵志道看了他的信后有自惭形秽感，不无气恼地承认自己的信有“语病”。在看杨杏佛翻译的《日本在中国之势力》时，赵志道又在习惯性地努力理解杨的文字，结果杨解释说：“译本中为人窜易者不过‘扶桑六千万岛民’、‘明目张胆’、‘尾闾’、‘鹰睨虎视’数名词而已。……此四名词当非用典之劣者，若不指出

^① 《杏佛日记》1918年10月22日，《啼痕》，第151页。

^② 柳亚子1912年致杨杏佛函，《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③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6年11月27日）。

^④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2月17日、8月3日）。

^⑤ 栾梅健著：《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5月版，第274页。

^⑥ 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241页。

^⑦ 《胡适留学日记》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42—244、250页。

^⑧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08页。

^⑨ 杨杏佛1915年8月24日致柳亚子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19页。

^⑩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6年11月27日）。

或无人知也。君可不必告令尊，累之大索中国典殊太苦。”^①

但是变化并不是没有。杨杏佛在美期间给赵志道的 300 余封信浸透了他的秋水神骨，以至于赵志道说他的信“冷”^②。但是有一封信却是例外，它写得特别俏皮生动，情人间情骂俏的欢乐跃然纸上。这是唯一的一封白话文书信，全文如下：

汝和吾爱大人麾下：

自己被告却反坐原告，还下令驱逐示威，吓得老夫（不称劳动贱役了，你不要胡扯）提心吊胆，走路出神，几乎滑死。写信来不及，忘记穿衣，一日头痛（现在好了，不要骂，放心）。你老夫子神通广大，小老儿由你处置，死也好活也好，只不要丢在街心便感恩不尽。天气怪冷，你又向我心头吹口冷气，可不冻杀我呀。人说胖子老实，我现在可不相信这句话了，你要再不理我任意欺我，我一定请医生开方，立刻发胖，看谁凶骇。汝和好孩子、好朋友、好妹妹、好人儿，一家好，一国好，天下好，好好好，与我好罢。我虽无用把你无法，须知天不绝人之路，猫儿无情还怕老鼠上吊（为甚么原故你猜）。我若急病，你虽是铁也要发软，你又何苦必置之死地而后生呢。今天在讲堂不知先生放了甚么，你一天不与我好，我一天鬼混，至先生发脾气赶出哈佛，来孟河读书为止。你怕不怕？老实告诉你，我同居的一位常先生今天早上已被 M.I.T 赶出了，这位先生不知何事也不用功，大概不是受冤。你愿意我在哈佛还是做斥退生？我可不在乎学堂，心不想读书不如到孟河受骂，你的气脸比讲堂先生的酸脸，我情愿看你气脸，你肯赏脸吗？好汝和，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小老儿不是，我指日来挑棍子讨打（负荆请罪的白话），从今以后你直管拳打脚踢，我哼也不敢再哼了。汝和你不是说永远爱我的吗？现在我高声叫你，你忍心不理我呀，我想你一定不至忍心如此，好心肝不要急死我。今天不能不睡，恐怕又是半夜胡思，你能随月来安慰我吗？愿你勿气，好睡多食。教我爱君，君不爱我呀。

秋水

七夜

你那两张秋天照片还我肯不肯，我又要去吓小妹妹了，你肯帮我吗？这是良心话，不要当取笑。^③

这样的信的确无法用古奥的文言文来写，杨杏佛已不得不承认“死的文字不能表现活的话语。”^④

四、在美留学生的友情与爱情

纵观杨杏佛留美时期的 300 余封致赵志道函，他在美读书期间有一个很庞大的“势力圈”（赵志道语——笔者注），以官费留美的庚款生和稽勋生为主，其中主要是一些中国公学时期的旧友如胡适（适之）、任鸿隽（叔永）、朱经农（杨杏佛戏称他朱三——笔者注）、张奚若（亦农）、饶毓泰（树人）、严庄（敬斋）等，还有的是他在海外认识并结成挚交的科学社社友如唐钺（肇黄）、梅光迪（覲庄）、陈藩（嵩青）、胡明复、赵元任、程孝刚等。其中以唐钺与杨杏佛最为亲近，杨认为在自己的交游圈子中“惟唐君最能忠告”^⑤，杨遇刺身亡后唐曾著《杨铨传略》追忆好友一生。^⑥另外朱经农和梅光迪也与杨往来也十分密切。因为杨杏佛的关系，赵志道也陆续认识了这些人。见到赵志道后，也是江苏武进赵氏家族子弟的赵

^①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8月7日）。

^②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1月10日）。

^③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3月7日）。

^④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14页。

^⑤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6年10月30日）。

^⑥ 见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8—39页。

元任特地写信回家询问，得知自己虽与赵志道年龄相当，但在辈分上要比她晚一辈，是她的侄辈。^①

杨杏佛将自己与赵志道的恋爱历程称为“罗马史”，与赵志道以“罗马友”互称。他把朋友来信中谈到赵志道的均装订成册，并依其“罗马开国功勋”次序依次排序。1916年的排次为“经农十三件；嵩青六件；掰黄七件；适之十件；亦农两件；叔永两件”^②。1916年、1917年、1918年每年一集，共成三集，“（第）三集惟朱先生者装成余未动，因年尚有大半也。惟罗马史之要目已演过，故此时之书札不过叙述，不如第一、二集之精采动人、引人入胜矣。”^③只可惜这些“罗马史书札”均已无存。

因为赵志道出身名门，又面容姣好，杨杏佛的朋友们纷纷要求杨代为引荐，以一睹佳人风姿。陈藩赞她颇具“林下之风”，张奚若慕其“风流文雅”。^④

赵志道字汝和，是赵凤昌继配周南的女儿，由于自小娇生惯养，养成了我行我素、敢做敢为的性格，性子十分刚烈。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时，赵志道正就读于中西女塾，看见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后，她兴奋异常，就与几个同学跟随张竹君的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武汉从事伤兵救护工作一月有余。回沪后被学校除名，于是赴美留学。^⑤1912年初到美国时，她先入威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在该校读书时认识了宋美龄。1916年10月，转入位于美国东部的孟河女子大学（Mount Holyoke College）学习化学。

1916年7月，任鸿隽和杨杏佛等在绮色佳结识了在纽约州瓦沙女子大学（Vassar College）历史系读书的莎菲（陈衡哲），9、10月间，刚刚就读哈佛大学的杨杏佛又在康桥结识了与任鸿隽和陈衡哲同来作客的陈衡哲女友赵志道、在麻省威顿学院（Wheaton College）读化学的柴冰海、与陈衡哲同期的庚款留美女生韩美英（赵志道在孟河读书时的同屋，1919年获孟河大学历史学学士。——笔者注）等。任鸿隽与陈衡哲“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增”^⑥，杨杏佛对赵志道也是一样。当赵志道来信以“先生”相称时，杨以“先生两字俗用太多，敬而远之或厌而苦之皆加以先生，我辈朋友任呼一名皆可，但勿以先生压之”^⑦，使赵不再称他“先生”，瞬间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赵志道和杨杏佛都是性情中人，纵观杨的书信，发现两人一路都在相互折磨。杨曾对赵分析原因道：“汝和、汝和，君一生受多疑之患，因好疑而自怨怨人，因好疑而使爱君者动辄得咎，更无好怀，人寿几何，以爱为仇，爱河诚苦海矣。此君所以每谓自识吾以来，历经许多磨折痛苦也。”^⑧其实这样的弱点杨杏佛自身也一样有，他不喜欢赵志道“臣门如市”，不愿意赵志道与男性多交往。“爱河成孽海”（出自杨杏佛归国后诗《醒歌》——笔者注），杨赵最后的结局其实在美时期就已露出端倪。

洞悉赵志道性格的陈衡哲和柴冰海二人曾劝赵“避爱”，预言她和杨不会长久，气得赵志道一度与二人断交，在杨规劝下方重修旧好。^⑨

1917年2月，任鸿隽由康奈尔大学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那里与陈衡哲的瓦沙女子大学距离甚近，“火车三时可达”^⑩。多事的杨杏佛写信给赵志道，叫赵志道写信提醒任鸿隽，陈衡哲的心并不在他处。杨写道：“任老先生二月初四日赴纽约，从此入梦。君宜作书警之，若彼已入梦不返而人忽超然出梦，殊难消受也。惟任先生会八股，能起承转合，或

^①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2月8日）

^②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7月12日、1918年5月21日）。

^③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8年5月24日）。

^④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8年4月24日）。

^⑤ 赵志道：《忆往事》，见 <http://www.shmg.org.cn/node787/node788/node790/node798/userobject1ai1730121.html>

^⑥ 任鸿隽：《五十自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684—685页。

^⑦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6年10月13日）。

^⑧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8年7月20日）。

^⑨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1月20日）。

^⑩ 任鸿隽：《五十自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685页。

可留人梦中，亦未可知。”^①这年春假，胡适通过任鸿隽与订交已有时日而未曾谋面的陈衡哲相见。陈衡哲对胡适一见如故，但对杨杏佛就不同了，曾作诗暗讽杨。回国后，有一次，陈衡哲用非常刻薄的言语当众挖苦囊中羞涩的杨杏佛吃白食，害得任鸿隽登门向杨道歉。^②而杨对陈也无好感，在杨给赵的信中，提到陈衡哲的地方，语气大多颇有酸味。在《中国学生月报》上看到陈衡哲自译的《风》《月》二诗后，他说陈“大有胡适之之风，皆好自译也”；^③赵志道急切地想见张奚若和严庄时，多疑的他以“莎菲不见胡亦可屈就”来讽刺赵“不见张严何至颠倒梦魂”；^④赵志道告诉他好像见到了早已回国的胡适，他却断言“果君见胡恐亦亦是莎菲”。^⑤

杨杏佛性格上虽有缺陷，但“道德甚高”，孝敬父母，重气节，不阿谀奉承，尤其他博学多才，诙谐善辩，所以他虽然待人处事经常会不惬人意，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非常乐于与他交往。1917年6月，胡适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后，准备由绮色佳回国，行前邀约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等故友来纽约相聚。朱经农特地从华盛顿赶往纽约，为胡适送行。杨杏佛本已应允赴纽约故友盛会，但由于忙于联系暑期务工场所以挣钱还债并寄父母家用，未能应约。遗憾之余，他作《赠经农》、《答叔永》、《再送适之》三诗。他遥想1915年赠别胡适由康乃耳去哥伦比亚时，胡适之“实则杏佛亦扬州梦醒之杜牧之耳”句，慨然而叹曰：“樊川去矣，老僧尚在蒲团上，不复梦青楼，但有国、亲与君三爱在心耳。”胡适行前也曾感叹：“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颢庄，定无《尝试集》。”他为此特作诗与任杨梅三人作别。胡适回国后，见杨杏佛寄来所赋三诗，回信对《再送适之》尤为赞许。^⑥

1918年10月，杨杏佛偕赵志道与任鸿隽一起同船回国。在他们前后，杨杏佛在美留学的“势力圈”中人相继归国，这批人均成为中国著名的人文学者、科技精英、政界名流。

从杨杏佛的家藏所及，纵观杨杏佛这一代官费留学生在美留学期间的经历，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群热血有为青年的朝气蓬勃。他们敢爱敢恨，积极主动地追求进步和美好。他们带着满腔爱国热忱发起的文学革命，去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陈旧和迂腐。他们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引进中国，在中国宣传科学进步，提倡科学研究，让“德先生”和“赛先生”走进中国……清末民初的这批官费留学生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留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①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1月18日）。

^②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22年4月8、9日）。

^③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8年2月11日）。

^④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8年5月18日）。

^⑤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8年5月19日）。

^⑥ 杨杏佛致赵志道函（1917年6月4日、6日、21日），《啼痕》第255—256页；《胡适留学日记》下卷，第360页。